

回顾 1950 年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黄达

“学科”，大多与高等学府“课程（我们还有一些古老的叫法，如教程、学程）”的开设密不可分。货币银行学学科就是这样。

编写这份材料的任务是“回顾”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的历程，是希望通过回顾，可以帮助从事和有志于从事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各位人士，大体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从中导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路……

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①请几位硕士生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处查阅了有关这方面的图书，翻拍了封面、序言、目录、版权页；^②请宋玮老师在美国的图书馆翻拍了十几本英文的有关著述。材料颇多遗漏，有待补充。现在暂按已有的材料做初步的整理。

概 述

“货币银行学”，是大专院校的一门课程。其开设，约有一百年；今天看来，依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西方，在这门课程发展的不同阶段，有 3 个代表性的名称：*Money and Banking*；*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实际上还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在 *Money and Banking* 阶段，有 *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Money, Credit and Finance*、*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 等。

在中国，“货币银行学”学科，或者说“货币银行学”课程，是“舶来品”，是对应西方的 *Money and Banking* 翻译而来的。引进的时间应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直到今天，在我们这里，这门不断发展着的学科，依然习惯概称为“货币银行学”。以“金融学”的命名代替传统“货币银行学”命名的，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在中国就曾有人采用，如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出版的黄曦峰所著《金融论》；改革开放后间有采用，如王松奇编著的《金融学》；本世纪初黄达主编的《金融学》是最近的一本。

在上世纪，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时候，苏联相应的课程和教材由两部分组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国在 1950 年后“学苏联”的阶段，大专院校相应开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与“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课。50 年代末，在“大跃进”和“解放思想”的鼓励下，开始有把两门课并为一门课并命名为“货币信用学”的试验，——体系基本与“货币银行学”相对应。但推进的阻力极大。改革开放，西方货币银行学的教材（以及西方经济学等相关著述）迅速引进并很快有译本公开出版。一些高校，立足于中国实际，总结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积极

吸收消化西方的货币银行学，来开拓中国货币银行学的学科建设。直到 80 年代末，即改革开放经历了第一个十年之后，把货币银行学分成“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门课的历史才告结束。

那么，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货币银行学的教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不外是两条路：

一是把西方现成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直接引进。80 年代初期已经开始翻译西方流行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学生可自由阅读。近 30 年来，这方面有两本翻译教材具有代表性：一本是 80 年代初期译出的 L. V. Chandler 和 S. M. Goldfeld 的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译名是《货币银行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研室译；另一本是 Frederic S. Mishkin 的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译本不只一个，译名或是《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或是《货币金融学》。至于直接使用原版教材，在 1985~1995 年间，由国家教委和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其一年制的西方经济学培训班上就采用了 Bruce R. Dalgaard 的 *Mon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y* 和 Frederic S. Mishkin 的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教学中直接用外文原版作为正式教本，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

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上，由中国人自己书写货币银行学教材。国家教委在 90 年代末提出的编写财经专业 10 门核心课教材——其中包括货币银行学——的任务，或许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标志。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教师投标，取得了承担书写《货币银行学》的任务并于 1992 年出版。与之先后，其他院校也开始了类似的写作。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货币银行学在中国的建设，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们习惯从立足点向前看。即使是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教师，甚至对刚刚过去十几年前的货币银行学状况也较少做认真的考察。重在瞻前，无疑是对的；但必要的回顾也是学科建设之不可或缺。现在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回顾 1950 年之前，也就是新中国建国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至于总结建国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后这两个阶段，有待来日，另作安排。

货币银行学是由货币学和银行学合并而成

在西方，在 19 世纪，已有货币学和银行学两门课程。上世纪早期留学欧美的学子，在归国后的著述中多次提到这两门课分设的情况。如留英人士崔晓岑在其所著《币制与银行》（1936 年出版）的卷首语中，就有“*Money and Banking* 本为两个课程”等语。

进入上世纪，出现了将这两门课并为一门课和两种教材并为一本教本的过程。

货币与银行应该说存在天然的联系。可能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在上世纪，对货币的研究重点在币值、币制，理论性较强；对银行的研究好像重点在于归纳业务、经营的已有做法和经验，“学理”的探讨较为浅薄。

由于两者的联系不仅越来越紧密，而且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合在一起讲授无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合理作法。至于一百年前，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思路变化则难以详知。

抽象地推论，银行券的广泛流通好像应该成为推动合并讲授的契机，但并没有成为事实¹。促使将它们合并讲授的，对“存款通货”的认定或许有关键的意义。比如，1945年在重庆初版的赵兰坪所著《货币与银行》，其自序中说：“……在通货数量之中，存款通货之地位已随信用制度的发达而提高。故欲管理通货，又需致力于存款通货的管理。而创造存款通货者为银行。……是以银行与货币，实有联系研究之必要。”

对存款通货的认定，也就是把可用于转账的存款视为与铸币、兑换券是同类的“货币”，而不是仅仅把这类存款的转账视为“货币的节约”，好像转变是在20世纪初。1904年，有一本David Kinley著的*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在这本书的目录中已见“存款通货”一节，列于“信用与物价”一章之中。日本学者高垣寅次郎所著的《银行论》（约在1930年），其序文中有“……力称来自商业银行放款之转账存款，为极有意义的创造资金手段，尤为佐野先生之卓见；今且成为不灭之真理矣”等语。从相关序文可知，佐野先生强调的这个见解至少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或更早。纵然他们都还没有把“存款通货”或“转账存款”直接纳入货币量之中，但已标示着这样的进展将日益成为经济常识。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几本货币银行学教材

现在，在图书馆查出的最早一本由中国人写的《货币银行学》，是1930年由黎明书局发行的。作者朱彬元，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曾任银行经理，并先后任教于清华、燕京、中央三校；成书之际，从政于南京立法院。在这本教材的自序中，说明编写的主要依据是David Kinley的《货币论》（上面提到，原著1904年出版；1924有徐宝璜、王怡柯两个译本）、陈家瓚的《银行原论》（1923年初版）和吴士瑜的《银行学》（1926年）。成书的两个来源——货币学和银行学——显然可见。

这本书在当时极受重视。封面是由胡汉民题字；写序的有邵元冲、马寅初、刘大钧、陈行、朱成章、陈郁、胡祖同、陈长衡等当时名人。

第一，这是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教材？在作者1930年6月的《自叙》中有“是编之作始于民国十二年”的说明，即开始写作时间是1923年；但没有说自己的著述是否是第一本。不过邵序讲：“研究货币的货币论，研究银行的银行论，本该编在一起”；合在一起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可补一下缺欠”。马序有“……关于银行学及货币学之单行本，流传市井者尚少，其能以货币与银行汇于一集，便于研究者更不多见，有之自朱君始乎？”至少，进入他们视野并引起重视的，这是最早的一本。

第二，在作者《自叙》中提到，开始写作这本教材时，“嗣任清华大学货币银行学讲席”，说明清华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已开设货币银行学课程。从马寅初的序则可看出，当时各大学已有货币银行学“学程”的开设。这就是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

西方把“货币学”与“银行学”合而为“货币银行学”，具体始于何年何月，有待进一

¹ 马克思在《资本论》III卷五篇的研究，足以使这两门课合二为一。

步查证。据手头材料整理：

191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译著《经济学各论》。原著者是日本人盐谷廉和坂口直马，译述者是王我臧。内容为：第一编货币论，第二编银行论，第三编外国贸易论，第四编外国汇兑论。日本人把“货币论”和“银行论”放在一起，可以推论，西方人已经这样做了，即要早于 1910 年。但作为经济学的“各论”把“货币论”和“银行论”放在一起，还不是标准的货币银行学。

1904 年出版的 *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在其作者 David Kinley 的序文中提到，之前已有 *Money and Banking* 的书籍问世。有待查阅。

1914 年，作者为 J. T. Holdsworth 的《货币银行学 *Money and Banking*》在美国出版。1934 年由张伯箴据 1931 年第五版翻译，世界书局发行。全书侧重于银行制度和业务的陈述，“学理”的讲述分量极少。不太“够”一本“学”的教科书。

1927 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一本《货币银行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作者为 R. D. Kilborne，这应是较早的货币银行学教本之一。1938 年，方铭竹、王清彬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中译本有周作仁和马寅初的序，均强调货币与银行的紧密联系及其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从美国图书馆翻拍了一本 *Money and Banking*，作者是 Frederick A. Bradford, Ph.D，其 1935 第二版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作者的《货币学 (Money)》和《银行学 (Banking)》二者整合而成为一卷本的修订版。”这句话说明把“货币学”与“银行学”合而为“货币银行学”的过程在上世纪 30 年代仍在进行。

在 1930 年朱彬元的《货币银行学》之后，在中国，有 193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货币银行学》，作者陈振骅；有 1936 年由开明、生活等书店经售的《币制与银行》，作者崔晓岑。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两本受到重视的教材；后来好多本有关货币银行著述所开列的参考书目中，都列入了这两本书。两本书的结构同型，均由两部分构成：或第一编是货币，第二编是银行，或上篇是货币论，下篇是银行论。

在 30 年代末，还有一本署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金融论》，作者黄曦峰。也是上编货币论、下编银行论。只是取名“金融论”，较为独特。不过 1934 年马寅初为《货币银行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的中译本作序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货币与银行构成金融之两大要素”。当时其他一些书序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以“金融”概指“货币”与“银行”的语句。看来取名“金融”之“论”，在中国，也非随意。

在 1930、31 年之交，有一本《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作为大学丛书出版，作者杨荫溥。这本书是教材，更是专著，是有关中国金融市场最有权权威性的著作。全书近六百页，一般的理论说明加上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概述不过二十几页，其余都是对中国金融市场分门别类的讲述。看似具体，但建立一个描述体系的本身却是以经济理论的功底为基础的。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为研究本国金融变动情状之结果。故本书之成，实祇可视为溥个人准备研究经济学原理过程中之初期附产品……”

抗战中间有两本代表性著作：其一是杨端六著的《货币与银行》，1941年于香港初版，1942年在重庆重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于上海印行。序文极有深度，今日读之，也多中肯之言；附有详细参考书目，有参考价值。其二就是在上一节提到过的赵兰坪所著《货币与银行》，天地出版社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

二次战后西方的有关教科书，翻拍了两本：

一本是1947年出版，以后直至60年代多次再版的 *Money and Banking*。作者是 Notre Dame 大学的 Raymond P. Kent。属20世纪中期标准的《货币银行学》教本，“主要面向大学本科、专科的学生”。

另一本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Albert Gailord Hart 著的 *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这本书，作者是作为“货币学”课程的教材来写的。但就其内容看，全然可以作为货币银行学的教本。实际上，在本书“前言”的行文里，“money”和“money and banking”好像颇难区分。

从简单的相加到融汇为一体，从微观分析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最初的货币银行学著述明显有货币学和银行学两部分简单相加的特征：无论中西，最初的货币银行学都是：前半货币，后半银行。货币部分除货币的产生和职能外，主要讲币值与币制；银行部分主要讲银行业务经营。而且，不论是对货币还是对银行，都是用微观分析方法进行剖析研究。

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重大的推进，那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对宏观调控的研究迅速形成体系。反映在货币银行学领域，一方面是重视了对货币与银行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同时更是重视了对货币、银行两者与经济生活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而在对货币、银行两者与经济生活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中，突破了微观分析的一统天下，宏观分析越来越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的，乃至具有统帅意义的内容。

如上节提到的1927年 Kilborne 的《货币银行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在中译本周作仁的序中特别指出，这本书不同于同类书的特点是，“著者对于货币银行系就其与经济组织全体之关系加以研究，注重阐明其原理与精义”；同时指出，“许多教本将货币与银行截然分为两部分说明”，而这本书“以价格制度为中心，一方阐明货币与银行之关系，他一方又论述货币银行与各种价格之关系”，所以具有统一之性质。在原著初版序中强调的也正是：“一方面是货币与银行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货币银行与各种价格的关系。各种价格是促进和统制经济活动的针眼……”是否可以这样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今日货币银行学设计思路之由来。

上节提到的1935年作者为 Frederick A. Bradford 的 *Money and Banking*，其目录平列40章，有关货币的章节和有关银行的章节反复交叉，而且设有“货币政策与商业周期”、“联邦储备系统下对信用的控制”、“未来对信用控制的可能性”等章节。

有一本1937年出版的 *Money, Credit and Finance*，作者是 George Francis Luthringer、James

Gerald Smith and Denzel Cecil Cline。标题有个“*Credit*”，不仅是表示重视货币问题中的信用因素，而且反映着这样的观点：“……通过对货币、信贷、银行与财政的讨论，得出现代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的结论。”标题中的Finance指的是Public Finance，把财政与货币、银行放在一本书里讲述，也是这种趋向的一个表现²。

上面提到的 1948 年 Albert Gailord Hart 所著 *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书名加上 *Economic Activity*，强调了紧密联系的货币与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从目录看，内容相当丰富。在本文“概述”一节曾经提到的 1987 年 Bruce R. Dalgaard 的 *Mone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y* 一书，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题名特点。

上节提到的 Raymond P. Kent 的 *Money and Banking*，作者在其第四版的前言中强调了他的一贯思路，这包括：“试图在货币银行理论的探讨和货币财政政策的讨论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包括：一贯期望学生能够对这样四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即“选择和维持给定货币本位制之深远影响，商业银行作为我们主要的货币创造机构所具有的非同寻常重要性，联邦储备当局在控制流通中货币总量上的能力和职责，以及联邦政府的财政调控对经济发展所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着这样的思路，其结构或许是“标准”的：第一部分货币，第二部分商业银行结构，第三部分商业银行营运，第四部分美国的中央银行，第五部分货币理论，第六部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七部分国际收支，第八部分其他金融机构。无论是表达的指导思想还是章节结构的安排，都可以理解为寻求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在中国人的著述中，1941 年出版并数次再版的杨端六著的《货币与银行》，其章节结构是简明的：总论、第一篇货币制度、第二篇信用制度、第三篇货币理论、第四篇货币银行政策。这样的章节结构。反映着当时货币银行学教材演变的趋向。

当货币银行学在综合货币学和银行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科并获得独立发展之后，货币学与银行学依然分别以独立的学科继续发展。而且，这三门学科是沿着西方经济学总体发展方向共同发展并相互推动的；或许更应该说，货币学与银行学的发展，不断推动着货币银行学的提高。因而，回顾货币银行学的发展历程，也需分别回顾货币学和银行学的发展历程。

货币学从货币价值的研究转向货币经济的研究

货币学应是古老的科学，以“货币”为对象，专注于理论的研究。研究货币不能不联系信用与银行，因而名为货币学的学科也都会讲述信用与银行。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货币学与银行学并而为货币银行学一门学科；而与之同时，“Money”——货币学并未失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依然沿着理论探索的路子继续发展，并形成“Money Economics”——货币经济学。

² 把Money、Credit(Banking)与Public Finance放在一起讲，在西方大学里好像没有形成一门定型的课程。在苏联时期，在非经济专业、非财政专业与非货币银行专业之外的专业中，开设“财政与信贷”课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设这门课程。设这样的课程为的是以较少学时讲授这方面的知识，目标是“普及”。其实，把Money、Credit(Banking)与Public Finance放在一起，完全可以设定“提高”的目标。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大学写出了《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确定的就是这样的取向。遗憾的是，没有坚持下去。

1947年,作为国立复旦大学丛书之一出版的《现代货币学》,在作者樊弘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货币理论的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一)货币价值研究时期,(二)货币经济研究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内,货币学只研究货币价值的意义,和货币价值的决定。在第二个时期里,货币学不仅研究货币价值的问题,而且要往前大大的踏进一步,着重研究社会经济的整个投资,储蓄与所得的动态的关系……”对于《现代货币学》这本书,作者自己介绍,在全书八章中,前三章是讲货币价值,后五章是讲“整个的货币经济的动态的关系”。这样的表述是否精确,当可推敲,但作为梳理发展脉络,提炼简单明了,对我们考察货币学的发展还是颇有帮助的。

有一本1884年的*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³,作者是W. Stanley Jevons。主要思路是考察金的价值波动和理想的完美通货制度。对应着“*Investigations*”,有18种统计图表。讨论贵金属流通下的币值和稳定币值的理想币制的指导思路,反映着当时货币学的基本趋向,不过,这本书的本身不是教材。此外,本书用的是Currency而不是Money,其他书有的也是这样的用法,可能反映当时对Currency和Money的用法与现在较为定型的用法不尽相同。

还有一本*Science of Money*,作者Alexander Del Mar M.E.,修订的第二版是1896年发行的。内容是对货币这个范畴,以及价值、价格、币制等的各个侧面作思辨式的理论剖析,反映着那个历史时期有关币制争论的背景。书中包含大量经济史的问题,乃至词语内涵的演变。比如,这样的讨论——“‘货币’这个字的起源——涉及纪元前273年前的任何时期使用这个词都是时代的错误——货币,或者说钱币(*nomisma*),起初意味着所有数量(*numbers*)的货币……在帝国和中世纪,货币是指一个或多个硬币(*coins*)……”,在其他货币学的著述中是极其罕见的。与上一本同样,它是反映着当时货币学基本趋向的专著,但不是教材。

在中国,流行的一本美国教材,是上面已经两次提到过的1904年David Kinley著的*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全书从“交换媒介”出发,分别讨论了货币——与贵金属连在一起的货币——的价值;信用与物价;不兑换纸币;可兑换纸币;货币制度与种种本位的设想,等等。应该是当时“货币学”的标准模样。中国有两个译本,都是1924年出版的。一本的译者是徐宝璜,北京大学印刷;一本实际属于编译,编译者是王怡柯,商务印书馆发行。

1905年,德国人Georg Friedrich Knapp写了一本*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1924年出版了英文译版。据说这是一本颇为有名的著述。对于自己的State Theory的理论观点,作者的解释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不是强制使之普遍接受,而是被public pay office认可的东西;并且本位不是选择金属的任何性质,而是选定影响与重要商业邻国的交易的深思熟虑的目的。”其思考范围依然是贵金属流通下的币值和币制。

1919年,作者为R. G. Hawtrey的*Currency and Credit*出版。1930年出了第三版的新版,有很大的修订,但在其新版前言中明确:“主要的论点和方法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说,应与

³ 这本书是在怎样的含义上使用Finance这个词,仅从目录中无法判断。但肯定不是指国家财政,也不是指以现代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金融”。

David Kinley 的货币学归入一个阶段。本书框架属于教材类型。

1922 年, *Cambridge Economic Handbook* 中有一个选题——*Money*, 作者是 D. H. Robertson。曾多次重印、再版。在 1948 年美国重印版的目录中可以看出, 包括二次大战中的许多货币问题在书中均有反映, 说明作者在修订、补充。但全书骨架的核心还是币值, 还是币制。作者在 1946 年第四版序中说: “1947 年后的读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做什么。在前八章, 他将以 1928 年的视角来看待 1928 年的世界。……在第十章, 我选取了在 1947 年 5 月在广播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但是无论如何, 这本著述是在当时西方经济学跨越发展的中心由一位中心人物写出的, 其指导思路 and 观点——经济学治学的指导思路 and 观点——应该反映着货币学推进的一个新的阶梯。

也是上世纪 20 年代初初版的一本 *Money*, 作者是 William Trufant Foster 和 Waddill Catchings。从 1930 年第六次印刷的第三版的目录看, 内容极具特色: 重点不在币值, 币制更是一点也未提及, 而是在于货币的环流 (the circuit flow of money)。作者是把问题追溯到存在货币的经济与实物经济有何本质区别的基本点, 来探讨“相对于由可用的人力、机器、原料和货币所决定的生产力, 生产却不能提供舒适的生活所需的产品”的原因。这的确是最彻底地从货币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建设“货币经济学”的努力。不过, 好像这本书的框架并没有成为后来货币经济学建设的规范。

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在其编辑的丛书中翻译了一本于 1935 年出版的《货币与经济体系》, 原著者伯恩斯坦, 译者刘镇泉。译本 1948 年出版。作者主张“管制的货币制度”, 认为一种具有创造购买力及消灭购买力的货币制度, 是现代政府极其重要的手段。这与摆脱不了金本位的思路显然有别。

1940 年初版, 作者为 Geoffrey Crowther 的 *An Outline of Money*, 从其 1948 修订版的目录来看, 重点已转向“货币经济”。全书十章, 除一般的货币理论, 有一章讲银行的货币创造, 有一章讲储蓄、投资和商业周期, 有一章讲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 有一章讲国际收支和国际均衡。仍然有一章金本位, 但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明确指出, 这一章“大部分是历史内容, 仅仅需要在尾部作大量修改, 并在结尾增加了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更可以说明这本书指导思想的是在前言中所明确表示的对 J. M. 凯恩斯和剑桥学派 D. H. 罗宾逊的衷心景仰。

在中国,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 有几本中国人编写的货币学。如 1917 年林传甲编辑的《实验货币学》, 1920 年费保彦、郁疑编的《货币纲要》, 1923 年王效文编的《货币论》, 1930 年叶作舟、郭真编的《货币新论》。这几本书均为编辑外国有关著述而成, 内容有的颇为简略。

在这期间, 大学的讲台上主要采用外文原版教材及其译本, 如上面提到的 David Kinley 的 *Money,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he Medium of Exchange* 及其 1924 年出版的两本译本。

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抗战初, 有三个大的经济动向推动着中国货币学的研究。最直接的是中国的白银流通已难以为继。与之同时, 一是世界全面的放弃金本位; 二是苏联的理

论建设,经过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对世界的影响迅速扩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灾难深重的国度。

规范的货币学教材有1936年出版的赵兰坪的《货币学》。这是作为大学用书编写的,篇幅颇大。分前后两篇:前篇讲一般货币理论,后篇讲币制。作者自序中说:“本书即据欧战以后,各国通货物价汇价之变化,以及最近数年,各国货币贬值政策与汇兑贬值政策之因果为背景,证明旧货币学理之失效,新货币学理,为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之理论依据。”同年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刘觉民的《货币学》,也属于这一类。横排本,篇幅较小。作者序中引用了凯恩斯的一段话:“货币原理并不是可以随时应用到实际政策上的确切不移的结论,而却祇是一种思考或分析经济现象的工具、方法、和技术。”又说,“……我们的研究态度就绝对的不应为一家之言所囿,我们必须博采群言……”这两篇自序都反映了时代的背景。

当时内容比较简略的货币学教材,先后还有多本。有一本侧重理论学说的教材:戴霭庐编译的《最近货币金融学说》(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丛书),1932年初版。

翻译的教材主要是来源于日本。其中有桥爪明男的《货币论》,译者顾高杨,民智书局1934年初版;牧野辉智的《最新货币学原理》,原书名为《货币学之实证的研究》,译者李荫南,黎明书局1935年初版;荒木光太郎的《货币与物价》,译者马咸,正中书局1937年初版,译者指出,该书属奥国学派的观点。从西方翻译的主要有一本,Edwin Cannan于1931年出版的*Modern Currency and Regulation of its Value*。这是一本世界名著,译者徐渭津,译名为《货币与其价值》,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这期间,中国的币制问题是经济生活中的焦点,文章极多,但成书者不多。在20年代末,国际银价下泄,极大地冲击中国的货币流通。1928年,金国宝著的《中国币制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永铭、马寅初为之序。钱序论中国自古以来有币而无制,及当时统一币制之必要;马序则集中提出银价狂泻对中国的重大冲击。30年代中期,有几本值得注视的书籍。一是Edwin Walter Kemmerer的*Money*,译者顾绥禄、张心源、赵锡麟,译本题名为《凯末尔货币论》,1934年由译者自己发行,孔祥熙为之题写书名。这是一本论证美国币制的文集,其所以翻译,无疑反映了中国币制改革之至为迫切。同时,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也有译本,译者岑德彰,书名即译为《货币论》。1934年有一本张家骧著的《中国之币制》,商务印书馆是作为商学小丛书出版的,但该作者的《中华币制史》是这本书的基础。最有特点的是1936年蒋廷黻的《纸币概论》,中华书局出版。其形式是教材,但就其出版时机来说,则实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作理论论证。为之写序的有钱永铭、吴蕴斋、秦汾、钟谔、金国宝、潘文安等名流,说明所受到的重视。

在这期间,有几本货币学的译本,表明在这个学术领域中苏联的影响在迅速扩展。一是《金之经济学》,日本猪俣津南雄著,汪耀三译。原版1932年出版;译本1935年由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刷。有李达的序,序文中指明,其前半部分是根据《资本论》写的。二是宫田保郎的《货币的实际知识》(原著再版时更名为《货币经济学》),译者赵乐人,1937年出版。从作者和译者的序文——译者的序文可视为导论——可以看出,所持的治学观点是马

克思主义的。另一本是英国人 L. E. Hubbard 于 1936 年写的《苏联之货币与金融 *Soviet Money and Finance*》，译者是万鸿开、李竹溪，译本 193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原著序可以了解：这本书反映的是一个持客观态度观察苏维埃问题的英国人的观点。

有一本“手册”之类的著作值得提及，即 Edward Kann 的《中国货币论》。这是外国人讲中国事情的著作，但讲中国的金、银、铜，内容非常丰富、详尽，极有参考价值。蔡受百译，1929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在 40 年代，也就是经受了二战和抗战的洗礼，货币学出现了新的面貌。

上面提到的 1940 年初版的 *An Outline of Money*，其重点已转向“货币经济”。可惜未见中文译本。1946 年，有一本 Arthur D. Gdyer 的 *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由李炳焕翻译，书名直译为《货币政策与经济稳定》，商务印书馆发行。

在此期间，中国人写了几本货币学教材。除上面提到的樊弘所著《现代货币学》外，1944 年赵兰坪的《通货外汇与物价》，从章节目录看，是一本有特色、有分量的教材（发行人是赵兰坪自己，邮购处为黎明书局）。1948 年初版的王传曾所著《现代货币原理》也是作为大学教材写作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发行。这两本，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但从目录看，好像不够充分。1944 年藤茂桐编著的《货币新论》由正中书局出版，属篇幅较短的通俗著作，但确是环绕着货币与经济的主题来讨论的。其他有 1943 年陈绍武的《货币学》，立信商业丛书；有 1946 年朱通九、徐日洪编著《货币学》，是“遵照部颁课程标准”为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编的教材。两书内容均较简略。

马寅初的《通货新论》，于 1944 年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后多次再版。讨论的主题是战后如何建立稳定的币制，应属专著。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战后经济问题之解决，必自解决通货问题始……”而写作的目标，“在将第一次大战后所发明的各种新学说，凡可为中国将来整理通货之理论的依据，与大战后各国整理通货之种种方法与步骤，凡可为中国整理通货之经验的根据者，著为专书……”本书涉及面较广，注重理论深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货币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 40 年代的后期，接近新中国建国的前两三年，反映着世界上两个阵营的形成和国内政治形势的迅速变换，出版了几本吸收苏联学界成果而写成的货币学。如 1947 年出版的杨培新所著《新货币学》，致用书店出版；同年出版的彭迪先所著《新货币学讲话》，生活书店编入其“青年自学丛书”中发行。

银行学的发展途径

重视联系货币问题的理论探讨和中央银行学的确立

银行学，是以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体系为研究对象。其早期，主要是具体讲述银行的各项业务及其操作手续，讲述具体的经营管理，讲述银行制度——银行体系由哪些种银行所构成，等等。也讲讲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为什么要存在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但均比较简单。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银行学建设的发展趋向是开始重视理论的探讨，特

别是重视联系货币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不单纯作业务、运营及制度的具体介绍。至于上世纪后期，对于金融中介理论不断深入的阐释，经营中风险管理的理论开拓和实践，从金融功能视角的论证，以及有关日益规范的、覆盖国内和国际银行业的金融监管的理论等等，则属于银行学建设的更高的阶段⁴。

关于西方早期的银行学著述，没有在国外图书馆查阅。仅就国内图书馆查阅的有关著述和译本作初步整理。

早期的一本有关银行学的译本，是《银行学原理 *Theory of Banking*》。原著者为 C. F. Dunbar，译者为王建祖、吴宗熹，商务印书馆发行。初版是 1911 年，多次再版。我们查阅到的是 1935 年的再版本。初版有管象颐于 1910 年写的序，七版有蔡元培于 1919 年写的序。在这本书之后的 1913 年，有一本由罗发森根据“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教头法学博士佐野善作”的讲授而编译的《银行论》，日本东京印刷，运回国内销售。还有一本《银行实务》，是彭兆璜主要据日本水岛铁也的《银行及外国为替》译编。这本书的银行业务名词直接引用日文汉字如“为替”外汇、“手形”字据之类，估计出版时间更早。

国人最早的著述是 1910 年由谢霖、李澂合著的《银行制度论》与《银行经营论》两本。前者有清室大员赵尔巽的《叙》，后者有张謇的《序》。一《叙》一《序》，均有值得参考的内容。这两本书有教材的框架，但从目录看，内容颇为浅显，恐反映不出当时西方相应教材的水平。

上世纪一十年代末至抗战刚刚开始的四十年代末，是银行学在中国迅速传播时期。

在此期间，主要有三本重要翻译教材：

其中有两本是译自日本的教材：一是堀江归一的《银行信用论》，初版 1913，并数次改版。译者陈震异，据 1918 年版翻译，1923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有马寅初、张嘉璈的序。这本书，是讲述“存款银行”，但也有相当部分讲述发行银行。另一本是高垣寅次郎的《银行论》，1930 年出版，译者顾高扬、宋家修，上海民智书局发行。从目录上看，如“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证券制度发达之金融上的意义”，“资金之创造”，“转账存款之创设”等等，说明这本书重视理论的诠释，并且视野超出“银行”之外。反映着银行学在当时的的发展动向。

三本中的另一本是 Chester Arthur Philips 的《银行信用论 *Bank Credit: 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and Factors Underlying Advances Made by Bankers to Borrowers*》，张先德译，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本书的上篇是“银行信用数量的讨论”，原著者序有“说明银行现金何以几倍成为放款与存款之基础”等语。如果说，早期的银行学是以货币的存在为研究前提，那末这本书则反映了一个推进的阶段：把银行问题与货币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

后来，在 1945 年，汪祥春、钱荣堃合译的《银行学新论》，由正中书局出版。但原著是于 1937 年出版的，应属二战前的著述。译序指出，这本书的特点是与货币理论密切联系的银行学。也就是说，其趋向与上一本《银行信用论》是相同的。原著者 R. S. Sayers，原书

⁴美国沃顿商学院在上世纪末，编辑了一本有关金融中介的论文集 *Intermediaries*，所收论文起自 19 世纪末年，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

名 *Modern Banking*。

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国人写的银行学著述甚多。

也许先要提到大约在 1919 年出版的一本《中华银行史》。这是了解中国银行事业发展的
一本重要参考书。作者周葆銮，当时名人吴乃琛、张大猷、王世澄、李景铭为之作序⁵。此
前，1905 年有一本《大清银行始末记》，“大清银行总清理处”编。属官方文档，有史料价
值。

大量的教材性质的著述。

1919 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银行新论》，作者汪廷襄，商务印书馆发行。有上述《银行
制度论》与《银行经营论》的作者谢霖写的序。序中有关于中国银行发展初期的分析，言简
意赅，有史料价值。

1923 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银行原论》，作者陈家瓚，群益书社发行。主要是讲述银行
各项业务，内容十分详尽。

也是 19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银行服务论》，编译者谢菊曾，在自序中说明，主要
依据的是 Harold E. Evans 的 *Talks on Banking to Banking Clerks* 一书。读者对象是银行业者。

1924 年初版并多次再版的《银行学》，作者陈其鹿，商务印书馆发行。属高级商业学校
教科书，内容是业务、运营及银行制度介绍。

1926 年由晨报社发行的《银行学》，吴士瑜作。马寅初以老师身份为之序，肯定作者关
于“论钞票与纸币之区别”的观点并论及当时中国商业银行分散发钞之混乱。该书讲述范围
未超出当时相关著述，内容也简略。

1929 年初版的《最新银行论》，作者徐钧溪，中华书局发行；1933 年该作者又由世界书
局出版了《银行概论》。内容均简略

1929 年，马寅初的《中华银行论》，作者起的英文名是 *A Study of Chinese Banking*，作
为“中国经济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特点，是全书始终都在讲中国的实际，同
时寓原理于讲述中国实际之中。作者在自序中认为，国内大专院校讲授银行学科“所选用的
教材，固当取诸西书，尤当讨论本国事实，引举本国证例，庶于学理与实际，均能顾及，俾
学者一读，不仅可得一种知识，即于基本学理所由生之环境与关系，亦可稍稍窥悉，此实著
述家之使命也”。这本书只有自序而没有大量名人的序，但在出版后的二十年间，它所引起
的重视却是其他相同书籍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1934 年生活书店出版的《现代银行实务论》，潘恒勤著。全书分“业务”、“事务”、“人
事”三篇，是一部由业界人士讲实务与管理的书，极具特色。蔡元培为之题写书名，章乃器
等为之序。后来该作者又于抗战后出版了《银行实务》，内容如书名所示，商务印书馆发行；
作为银行学会实务丛书，银行学会朱斯煌为之序。

1935 年作为教材出版的一本《银行论》，其作者卓定谋，是从事 20 余年的银行业者。
序言中说明，是参考多部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编辑而成。从目录看不出多大特点。

⁵ 吴序有 Bank 译为“银行”及日本人循中国的译法也译为“银行”的记载。

1935年,朱彬元——1930年由黎明书局出版了《货币银行学》的朱彬元,又在该书局出版了《银行学》。属实务教材。不过,其横排版式在当时颇有特色。

1937年,商务印书馆在其“现代商业丛书”中出版了刘冠英著的《现代银行制度》。这本教材是专门讲述银行体系的,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各种银行及其在各国的情况。自序说明,全书以“分业”与“兼业”之比较为主线。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银行经营论》,讲银行业务和经营管理。作者朱斯煌,在当时的银行学会任职,颇有名气。序中详列参考书目,反映了作者所肯定的作者和著作,是了解当时金融学界状况的重要史料。

除教材性质的银行学著述外,还有许多专著和译著,以及一些普及型的小册子。

其中,介绍外国银行制度的著述和译著有:约于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欧美银行制度》,原著者 Kennech Mackenzie,原书名为 Banking Systems,译者李达理;约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资耀华所著《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属实地考察报告。

当时,中国人对合作事业颇为关注。约于1920年之际,有于树德,主要依据日本文献,编了一本《信用合作社经营论(一名平民银行经营论)》。推动者是“新中学会”。后来,有许天虹,把 C. R. Fay 所著的 *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的第一篇翻译出来,并冠以《欧洲合作事业之回顾第一篇——合作银行》的书名。

小册子之中也不乏名人的著作。如杨端六的《银行要义》,1930年出版,属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选题。虽然序文说篇幅不过万余字,但列有精选的外文参考书目,颇值得学习。

出版于上世纪一十年代末至抗战刚刚开始的四十年代末的有关银行学方面的著述,数量的确甚多,然而,不论是教材还是专著,基本上还是延续讲述业务、经营和制度的窠臼,没有明显反映出当时,特别是三十年代西方对银行理论的发展。

不过,应予肯定的是大多著述均关注中国问题。“关注”方式,除马寅初的《中华银行论》所达到的境界是个特例之外,大多还是以外国的著述为蓝本讲述银行一般问题,然后以相当篇幅介绍中国情况,并陈述自己的见解。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教学、研究和引进西方理论成果的进程。抗战中间的著述较少,值得提及的有两本。其一是《各国银行制度及我国银行之过去与将来》,交通银行经济丛刊之一,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交通银行行长钱永铭就决定编辑经济丛刊写了《发刊词》,有史料价值。其二是1941年由福建省一个经济委员会出版的《地方银行概论》,专著性质,作者徐学禹、丘汉平。这本书的序言可以视为结合实际的特论。

从抗战胜利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在动荡的岁月中,有关银行学的著述仍然不多。

译本只有前面已经提到的1945年汪祥春、钱荣堃合译的《银行学新论》比较重要。

教材主要有三本:一是刘全忠的《银行学》,1944年正中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在序言中虽然提及“晚近统治经济之说,风行一时”,但在内容里好像并没有展开探讨。二是张学骞的《银行学概论》,1946年9月试版,北新书局发行。作者在自序中,从评论“货币学

是学，银行学是术”说明，“银行学是银行的实用理论（包括业务和政策），不是货币学原理，也不是银行实务和会计”，给银行学的性质作出了界定。就目录看新意不多。三是王传曾的《现代银行原理》，1947 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大学文库”的总目下出版。他在《序言》中对货币银行学的发展（理论与体系）有高度概括，值得参考。1948 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又出版了他所著的《现代货币原理》。这是一位既写货币学也写银行学的作者，但却没有尝试把这两者合在一起。

专著有寿进文的《战时中国的银行业》，1944 年初出版。从前言看，书稿完成于 1943 年。

在上世纪初，银行学发展还有一条途径，是中央银行学作为一门学科从银行学之中独立出来。将中央银行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作为专著出版不早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台湾银行翻译的一本《中央银行论 *Central Banking*》，在原著者 M. H. De Kock 于 1938 年为其第一版所写的序中，对有关中央银行的著述有相当系统的考察；而对这门学科的确立有这样的判断：“将中央银行业务作为科学分析对象并予以研讨，并将它和其他银行作不同的处理，只不过是最近的事。在 Kisch 和 Elkin 共著的《中央银行论》于 1928 年初出版以前，并无标题为《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业务》的著书。”

Kisch 和 Elkin 共著的《中央银行论》，1928 年出版；陈清华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约出版于 1930 年。原著的出版颇受重视，英格兰银行总裁挪门氏（Montagu C. Norman）为之“叙”。这篇“叙”透露了“中央银行学”从“银行学”独立出来的信息。处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挪门氏，认为中央银行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自然发展时期”，这时，关于中央银行问题，“顾世人初未尝加以讨论者，诚以各国之法律既各不相同，习惯亦复互异，所谓中央银行者，只因其国家之需要自为发展，固无一般可据之原则以为此发行银行之指导也”。战时是第二阶段，中央银行运作的成规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属第三阶段——“复兴时期”，旧有的中央银行考虑如何恢复，新的中央银行又纷纷成立。于是“中央银行的职责和权力成为可资研究的问题”；相应地“自有各种理论之阐明，试验之发展”。从挪门氏所概括的这种背景，很容易理解对中央银行的讨论自然会从原来在“银行学”中的一章、一篇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本《中央银行论》的内容也正反映了这样的背景。其一，章节按问题设置，如“中央银行行为泉币之枢机”，“国家与中央银行之关系”，“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之关系”；其二，“书中于各国中央银行的条例规章，征引繁博，备述其理论以相探讨”，经点数，共涉及 28 家中央银行。译者陈清华曾在大学讲授银行制度，1928 年起，参与国民党政府创立中央银行的拟定条例，编辑规章，后并任职中央银行。

认定 Kisch 和 Elkin 的《中央银行论》是第一本有关中央银行著述的 Kock，他的《中央银行论》于 1938 年的第一版之后，1954 年出第三版。台湾银行的译本应是第三版，译者谭振民。第三版共设 18 章，涉及中央银行的方方面面，用现在的眼光审视，也相当全面；而且相当大的分量涉及宏观调控、宏观干预。虽然在其序文中并没有使用宏观这样的字眼，

但其写作目标却是从中央银行角度,对当时“各国经济学人关于中央银行业务的原理及活动所作有价值之理论的分析”——实际是要求赋予中央银行以宏观调控使命——之可行性进行讨论。

中央银行学的独立发展提高了银行学的宏观分析水平,也提高了货币银行学的宏观分析水平。

由于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即酝酿成立中央银行,所以在西方有独立的中央银行著述不久,中国人也出版了几本中央银行学的教材:

约为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梁钊文的《中央银行制度概论》。作者在例言中说,这本书几乎尽从有关著述“采纂而成”。用Kisch和Elkin的《中央银行论》衡量,内容较为陈旧。只有一章“中央银行操纵金融之政策”的题目,有些特点。在其所举的参考书中有一本孙祖荫著《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应属于中央银行学的著述。但在本次采集书目中没有见到,有待查阅。

1934年,中华书局在其社会科学丛书中出版了陈天表的《中央银行之理论与实务》。内容较为简略。

1935年,崔晓岑的《中央银行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之一出版。内容翔实。马寅初、徐寄庠、徐新六、唐寿民、章乃器、陈光甫、陈健庵、杨荫溥等为之作序。马寅初、徐寄庠、杨荫溥等几篇序文均有见地和史料价值。次年,该作者出版了由开明、生活等书店经售的《币制与银行》,这在上文“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几本货币银行学教材”一节中已经提到。

建国之际的短暂阶段 有关货币银行学科的一些情况

新中国建国不久,就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这本来是政治、外交的方针,但实际发展为在一切领域,也包括教育和学术领域,既从方针政策,也从具体规章制度,都要全面地、一丝不苟地照搬苏联的做法。而保证这一方针贯彻的是教学和研究一体纳入自中央由上而下的组织行为模式。在这样的方针体制之下,货币银行学科也同样纳入由“组织(不论是大学的教研室,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各级科研机构,还是国家主管财政金融的行政单位)”来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轨道。这是一条相当值得总结的路,需要另行研究。

在这个“一边倒”尚未正式提出,或是尚未雷厉风行贯彻之前的短暂阶段,货币银行学科也有值得记述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并非来自于从上而下的组织贯彻,而是分散的行为。分散行为也要有推动力,就这些成果的内容和倾向看,决定的因素有二:一是发自对新中国的拥护和殷切期望,二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其间主要的成果有:

1949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发行了李达著的《货币学概论》。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著作,讲述马克思《资本论》的货币理论,严谨规范;其体系安排,是以苏联当时有关货币理论建设所形成的体系为蓝本。

1949 年 11 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了莫迺群著的《货币和银行》。这本书篇幅不大，属普及读物，但讲述了一般货币银行理论和资本主义的货币银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银行以及新中国的货币银行问题。

1949 年 12 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货币信用论教程》，原编纂者苏联 G. 加兹罗夫，是苏联组织编纂的理论层次较高的教材计划中的一本。译者汪耀三。上面提到，他在 1935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日本猪俣津南雄的《金之经济学》，也是马克思观点的著述。

1950 年 8 月，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了《苏联银行制度》一书。原著者苏联巴狄烈夫、乌索斯金，译者王运成，是作为“苏联研究丛书”出版的。

1951 年 10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郑伯彬著的《新货币信用制度》。作者在序中说，这本书是“个人研究的一点成果”。“个人研究的一点成果”，应属分散的行为。或许可以把这本书视为学科建设分散行为模式的最后一本。

这是一个极为短暂的阶段，但不应忽视。现在看来，无论如何应予肯定的估价。